

1994年元史研究概况

吴海涛

1994年的元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一年来,有5部专著(含译著)问世,发表的论文达120余篇。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一、政治、军事

政治史研究在元史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元代的宰相制度,是本年度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张帆在《论元代相权》(《学人》第4期)中,探讨了元代宰相的设置及其职权,并认为元代宰相权重的原因是:首先,政治生活中存在使宰相易于专权的机构;其次,制度上对宰相专权所作的限制很少;再次,与元代具体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尤其导源于元代最高统治集团的统治意识。他还通过《关于元代宰相衔号的两个问题》(《国学研究》第2卷)一文,考察了元代中书令、参领中书省事、商议中书省事、平章军国重事、录军国重事这五种衔号的称号的内容及其实际意义,并探讨了元代以相衔为加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这个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官制的复杂性。盛奇秀探讨了元代中书省存在的时间,元代中书省长官的官称、编制、品级等问题(《元代宰相制度研究》,《文史哲》第2期)。

元代奉使宣抚政策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李治安系统探讨了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对奉使宣抚的宗旨、职权、性质、特征及其使臣的人选均进行了分析(《关于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载于《中国史论集》。此书是为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论集》编辑组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与蒙元史有关的论文有16篇)。日本学者大岛立子在《元朝官僚俸禄考》(同上)中,从新的视角考查了元代官僚经济问题。他整理有关元朝官僚俸禄制度的史料,分析了俸禄的实际情况,并讨论了俸禄在官僚个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另一日本学者海老泽哲雄考查了元贞元年有关僧侣的新税则的出台经过及其内容和执行情况。这个研究有助于元代政治特征的研究(《关于元贞元年〈僧道租税体例〉》,同上)。高伟的《元代太医院及医官制度》(《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和《元代医家入仕现象初探》(同上第4期),对元代医官及医家入仕现象作了研究。前文考述了元太医院建立发展过程,探讨了太医院及所属御医、医学、官医、惠民药局四个系统的职责和医官设置情况,是对《元史·百官制》有关部分的更正与补充。后文认为在元代的职官编制中,医官占有相当的份量,由医官转为文官,在元代并非罕见。

关于忽必烈的统治方法,吴柏春和白万柱·阿拉坦昌分别撰文《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第2期)和《论忽必烈的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统治艺术》(同上,第4期)。舒正方认为元英宗与丞相拜住,坚持“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的儒家学说,励精图治,使元朝又出现了期复中统至元之盛的“至治之政”(《英宗与拜住的励精图治》《内

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赵永春和兰婷在《元顺帝时期的党争及其危害》(《松辽学刊》第2期)中,论述了元顺帝时期的几次党争,指出这主要是君臣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表现,也是元代中期党争的继续。任崇岳的《元代治安制度述论》(《中州学刊》第1期),对元代中央和地方的治安措施进行了探讨。元代的吐蕃等路宣慰司即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其汉文史料极为少见。有关它的建立年代、治所、管辖范围、长使及下辖机构等问题均不清楚。张云的《元代吐蕃等路宣慰司史地考证》(《民族研究》第6期),依汉藏文史料,对其史实地理加以考证,使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此外,关于政治人物研究的主要论文有吴柏春的《忽必烈与佛教》(《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第4期)和郑忠的“决去岂我志,知止亦所谖”:略论元代虞集的政治生涯》(《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法制史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陈高华在《元代的流刑和迁移法》(《中国史论集》)中,对元代流刑和“迁移”的具体内容加以论述,并分析了二者的异同:二者都是强迫犯人前往外地,而且在发遣以前都要加杖刑;其不同之处是,流刑按民族成分区别发遣地,有相当一部分是“充军”的,虽无年限,但遇赦即可放还,而迁移则与上述情况不一样。这个研究便于人们弄清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赵文坦的《元朝的狱讼管辖与约会制度》(同上),探讨了元代多元的狱讼管辖系统;主要探讨了约会制度,包括约会制度的颁行、案件范围、审判的处所、作用与弊病及其对明清审判制度的影响。这是国内法制史界和元史界对这一制度第一次专文论述。古代的蒙古法制,可分为四个发展时期:蒙古习惯法时期、成吉思汗大札撒时期、政教并行时期和清朝统治时期。奇格的《试述古代蒙古的法制及其主要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分别对各个时期的法制及主要特点作了论述。关于元代佃客的法律地位,史学界一般认为是极其低下的。桂栖鹏在《元代佃客法律地位辨析》(《浙江师大学报》第3期)中认为:从总体上看,元代佃客的法律地位不低于宋代佃客,显然高于同时的奴婢。

军事史方面,陈友和在《论忽必烈时期的几次对外战争》(《中国史论集》)中,从宏观的角度着眼,对元初对外战争的历史背景、动因与目的、战争的结局及其对各国历史的影响作了探讨。王晓欣以和其他社会阶层作横向比较的方法,研究了元代士兵经济待遇中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与以前学者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元代北方军户总的经济地位不算低,新附军户的经济待遇和北方有所不同,其经济地位比宋朝有所下降,这反映了元军制在地域上的不协和,军户制本身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关于唐、元士兵经济待遇的几个问题》,同上)。

关于元末农民起义,魏嵩山在《元末刘福通等起义经过与最初起义之地考实》(《中国史研究》第1期)中认为,已往史家述及刘福通起义经过与最初起义之地,皆与史实不符。他对以前观点逐一辨析,认为:刘福通是与韩山童、杜遵道等一同举行起义的,其最初起义之地即在刘福通故里今安徽省界首市城内。由于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随母杨氏逃入今河北武安县山中,刘福通等则继续坚持领导起义,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3日攻陷颍州。

二、经济

有元一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呈现出与以往封建王朝不尽相同的新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迄今尚无认真的研究。李治安在《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南开学报》第

2期)中,从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和支用,行省在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中的作用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探讨。修晓波的《元朝斡脱政策探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第一次从元朝政策的角度去专门研究元朝斡脱,对其含义、特权、斡脱总管府的行废及其与泉府司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元朝斡脱政策的变化,与统治者的利益以及斡脱政治靠山的沉浮紧密相关。张全明和雷信泽探讨了元代赋税课管中对田赋、专卖品与市舶、商税违法处罚的规定和元代赋税课管违法处罚的基本特点(《论元代赋税课管中的违法处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关于元代审计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智安莉的《我国元代审计制度的特点》(《山西财经学院学报》第1期)和张达聪的《元代的审计》(《财会月刊》第6期)。耿占军探讨了元代人口问题(《元代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浅议》《唐都学刊》第2期)。赵经纬的《元代的天灾状况及其影响》(《河北师院学报》第3期),对元代天灾情况及其影响作了研究。

区域经济方面,韩国学者李玠奭在《14世纪初漠北不稳定的游牧经济与部民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中,探讨了元中期漠北地区的经济生活状况。谢志诚的《论元代北方的农林业》(《河北学刊》第6期),探讨了元太祖和元世祖时期北方农林业的发展,认为元代北方是农林业生产恢复发展较早的地区,为蒙元王朝统一天下在物力、人力上起了保障作用。元世祖时期是北方农林业发展最好的时期,并有着它自己的特点,对明代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此类论文还有张仁玺的《元代山东经济述略》(《山东师大学报》第5期)和吴宏岐的《元代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地域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三、民族、宗教

刘迎胜在西北民族史和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的《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在充分发掘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察合台文史料的同时,运用了科学对比方法,还利用了几种欧洲文字和日文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蒙古西征历史背景、蒙古在中亚统治的建立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海都和都哇与元廷的战争、尼仑与迭列斤蒙古的关系及西北历史地理等问题,对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孰为正统和海都叛乱的原因等问题提出了新见。另外一本民族史专著是《蒙古族通史》(上册,蒙文),该书由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编,民族出版社蒙文编辑室译,民族出版社出版。

关于回回人与元代政治,杨志玖教授做了大量研究。他在《回族研究》1994年第1、2、3期上相继发表《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二、三、四),对从元世祖时期直至元顺帝时期的赛典赤·赡思丁、阿合马、赛典赤·伯颜、阿里、合散、彻里帖木儿和老的沙等回回宰相的政绩、得失分别加以辨析,同时阐述了回回官僚的权威地位在元代的兴衰过程。这种把政治斗争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对回回人在元代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工作。李松茂在《元史与回回史》(《文史知识》第7期)中,认为回回人在元代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在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方面贡献巨大,所以,研究元史离不开回回史,研究回回史首先要懂元史。

有关畏兀儿研究的主要论文有罗贤佑的《论畏兀儿贯氏家族两位代表人物的历史业绩及其社会原因》(《民族研究》第5期)和田卫疆的《试论元代畏兀儿人在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作用》(同上,第1期)。前文对畏兀儿贯氏家族的两位代表人物阿里海牙和贯云石加以评述,从而探

讨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形势下,畏兀儿人所建树的历史业绩。并指出,元初和元中期不同的历史环境,造就了元代畏兀儿人中不同类型的风流人物。后文探讨了元朝建立前后,畏兀儿人对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桂栖鹏和尚衍斌在《元代色目人进士考》(《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中,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对61位色目人进士的有关事迹进行了考述,内容包括:籍贯、字号、家庭、登科年分、入仕等情况。蒙古人是什么时候起采用了“Monggol”(蒙古)这个族称的?该族称的起源从何而来?它的词义又作何解释?它最初的读音是什么?后来又发生了哪些演变?对此种种,学者们的回答不一。芒·牧林在《蒙古族称(MONGGOL)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中,对“Moggol”一称的原貌和起源进行了考补。禾木考察了元代女真人的社会状况(《元代女真社会之考察》《长白山论丛》第2期)。

宗教方面的专著有苏鲁格和宋长宏著的《中国元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

薛学仁在《元代宗教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中,探讨了元代宗教政策的演变:太祖、太宗时的尊崇道教、宪宗到顺帝的尊崇佛教。他认为元代宗教政策的特点是:从事商业、手工业、高利贷厚敛财富;设立完整的佛教管理机构;宗教首领地位超过以前各代;影响了元朝统治秩序等。张迪修探讨了元统治者的宗教观等问题(《蒙古皇族的宗教观和元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北方论丛》第1期)。有关蒙古萨满教研究的主要论文有董德富和苏鲁格的《略论蒙古萨满教的起源与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和朋·乌恩的《蒙古萨满教研究三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前文认为蒙古萨满教与我国北方诸民族原始宗教,可以追溯到同一个起源。但它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而残存至今,经过了漫长的积累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内容的宗教世界观。后文不同意史学界关于萨满教是原始宗教说的观点,认为萨满教在当时已构成了一套以“天命论”为核心的教义体系,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此文还探讨了萨满教与古代游牧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及萨满教衰亡的历史原因。

四、文化、社会史

文化与社会史的研究继续为元史研究者所关注。

有关此方面的专著有色音的《蒙古民俗学》(蒙古文,民族出版社)和秦志勇的《中国元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关于元代的学校,王风雷在《元代书院考遗》(《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中,系统探讨了元代书院的命名方式、性质、类型、特点、教学科研、学田、财产及其印刷技术等。同时,邓洪波在《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同上,第6期)中,探讨了元代的书院政策、发展过程及其官学化等问题。这两个研究,使人们对元代书院有了一定深度的完整认识。胡务认为,元代的庙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庙学的管理逐渐加强,其组织也进一步完善。他在《元代庙学的组织与管理》(《中国史论集》)中,考察了元代庙学的祭祀礼乐,学田的管理,教官的选举、俸禄、品秩及迁转,教学组织及其作用等。王立平探讨了元代地方官学(《元代地方官学》《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

阎玉启认为,元初的顺德学派,其主要成员有刘秉忠、张文谦、郭守敬等,是当时研究科学

技术的群体,其主要成就有修建大都城、开通惠通河及对天文学的研究和探索等(《元初的顺德学派》《光明日报》7月4日)。在元世祖时期,始终存在着以“义理至上”为宗旨的儒臣政治集团,与以王文统、阿合马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萧功秦在《元代儒臣的反功利思想》(《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中,考察了儒臣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反功利的根本倾向以及这一倾向对元代政治的消极影响。这一研究不仅对于认识元代中后期的政治变化可以提供若干重要的历史背景,而且对于认识一个时代特定的文化思潮对人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活动的能动影响,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李瑛国的《蒙古西征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第3期),主要以今新疆维吾尔族的史料为依据,从维吾尔族语言文字的变化、音乐舞蹈的发展和文学发展的三种倾向等方面,探讨了蒙古西征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张来仪在《试论蒙元时期东西方人员的往来》(《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中,论述了蒙古扩张过程中和元朝建立后的东西方人员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东西方相互了解及东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

美国学者陈学霖在《“一箭之遥”证史》(《中国史论集》)中,探讨了“一箭之遥”一词的来源及其在史籍中的记载,主要考察了蒙元时期的“箭程划地界”等习俗。从“一箭之遥”这个出于“箭程”习俗的词语,我们窥见到古代游牧民族对汉文化的一种贡献。

饮食文化方面,陈高华在《元代饮茶习俗》(《历史研究》第1期)中,探讨了元代名茶种类、制茶和饮茶之法,并大体推断出:13世纪下半期起,蒙古人已对茶有所接触并发生兴趣;而到14世纪上半期,已成为蒙古人的一种重要饮料。但蒙古人饮茶方式有别于汉人传统方式。这一研究有助于人们对元代饮食生活特点的认识。蔡志纯也探讨了蒙古人饮茶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茶文化(《漫谈蒙古族的饮茶文化》《北方文物》第1期)。香港学者陈伟明在《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第2期)中,探讨了元代饮料的消费生产种类和特色,反映了元代饮料消费生产,已成为饮食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

习俗方面,邢莉在《蒙古族的诞生礼和丧葬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中,探讨了蒙古族的求子方式和诞生礼仪、丧葬礼仪及其生死观的价值。陈焯的《蒙古族的祭祀习俗及其变迁》(《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探讨了蒙古族的祭祀习俗及其变迁原因和变迁特点。蒙古族的祭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沙宪如在《蒙古族祭祀风俗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中,探讨了蒙古族祭天、祭火、祭敖包的方式和含义。元代蒙古人中有“烧饭”、“抛盏”祭祀之俗。那木吉拉在《“烧饭”、“抛盏”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中,就“烧饭”与“抛盏”之间的关系及“掘地为坎以燎肉”与“合礼鲁、亦捏鲁”等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使人们对这一风俗有更深层的认识。蒙古族和其它一些北方民族都信仰过敖包。鄂·苏日台的《论“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就“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作了探讨,并将其与萨满教及“萨满教文化”作一比较研究,以便人们从中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蒙古人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长期的历史实践和马对蒙古民族的功绩,造就了蒙古人崇马的习俗。波·少布在《蒙古民族的马文化》(同上,第1期)中,分别对蒙古文学艺术中、社会生活中和祭祀习俗中的马进行论述,探讨了蒙古人的马文化。此外,葛根高娃·乌云巴图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分期描述为:孕育雏型期、成熟繁荣期和衰败转型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分期》,同上)。洪玉范的《蒙古族文化浅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探讨了蒙古族的思想文化、生产生活文化和审美文化。

五、史料、文献及其它

史料和文献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元朝与欧洲的交往相当频繁,元时来中国的欧洲使者、基督教教士和商人很多,但是,有关的汉文史料却极少。陈得芝在《元仁宗时教皇使者来华的一条汉文史料》(《中国史论集》)中,通过对元人朱德润的《存复斋文集》卷五《异域说》中所载欧洲使者来华一文的研究,认为文中所载延佑年间来元的“佛臬国使”,就是罗马教皇克力门五世所遣安德鲁等教士。这是一个重要的汉文史料发现,它更有助于人们了解元时中外交往情况。方龄贵在《〈通制条格〉札记》(同上)中,对当时习用的一些语汇进行探讨。他认为“下次”一词,释为使令、指使、吩咐、知照、打发,于义较切。同时,他还解释了“道子”、“怯里赤”、“革前、革后”的含义;并对大都路下之永宁路和永州北仓中的“永州”提出了质疑;对《条格》卷一七中的“共被泣荆谊感宗族、散财焚券惠济乡闾、执节不回如文宁女、临难不避如义宗妻”等各条作出了释说。马可波罗书的真实性自问世后即受到一些人的怀疑。杨志玖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第2期)中,首先辨析了怀疑论者提出的论点,进一步肯定了此书的真实性,然后就王育民的《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所提出的商榷意见予以答复。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著录了《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的三个清影元抄本。杨讷的《关于〈元统元年进士录〉的版本与校勘》(《中国史论集》),介绍了北京图书馆的两部清抄本和南京图书馆的藏本,后又用北京图书馆的两个抄本来校正王颀点校本的错漏;又探讨了钱大昕抄本、陈揆抄本和点校本中,关于会试名次,特别是汉人南人会试名次的歧异。这个研究为以后学者正确地引用王颀点校的排印本,提供了便利。罗桑丹津写作《蒙古黄金史》的年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色道尔吉的《罗·〈黄金史〉成书年代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根据史事和书的内容,推断其大致成书年代为1634到1652年之间。

黄时鉴对吾古孙仲端的《北使记》细加考证,认为书中对于“回纥国”三个种类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成吉思汗西征时期中国各族人士对回回的实际认识。在这里,没速鲁蛮回纥指的是河中地区和花刺子模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人和突厥人;遗里诸回纥指的是也里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人;而印都回纥则指的呼罗珊以东迄至印度河上游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释〈北使记〉所载的“回纥国”及其种类》(《中国史论集》)。姚大力在《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同上)中,通过大量史料文献,探讨了“东诸侯”中的“王及侯”、札刺亦儿部的漠南游牧地、乃颜的世系、乃颜之乱史事补证、“按只歹”的蒙古原名等问题。一些学者,如达尔玛·顾实在其《金轮千辐》一书中,认为绰·莫尔根即是耶律楚材。乌兰杰在《耶律楚材与绰·莫尔根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中,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根据大量史料进行考证,认为绰·莫尔根是《忙哥撒尔传》中所提到的喇阿·默尔杰。赵永铨研究了《成吉思汗祭奠》中的祈祷词(《大自然的要求,灵力的讴歌:〈成吉思汗祭奠〉祈祷词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南宋时期开始形成的《通鉴》学,在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瞿林东在《元代〈通鉴〉学和〈通鉴〉胡注》(《史学月刊》第3期)中,探讨了元代《通鉴》学的发展及其发展原因,并认为《通鉴》胡注的主要成就是:对《资治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有疏通之功;寓历史评论于注文之中,反映了注者进步的历史观;便利了《通鉴》的阅读和流传等。

包祥在《汉城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献》(《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中,详细介绍了汉城发现

的八思巴字文献。这份八思巴文献经过研究解读,为八思巴字标注的汉语音写,属于皇帝圣旨,是元顺帝于元统二年正月,即1334年颁赐给高丽领袖人物李汉达的。圣旨共3页,13行,54个字,内容是封授李汉达为“大元降虎府武德将军”、“高丽国万户府万户”之职。这不仅对李汉达本人,而且对李氏家族的进一步兴起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对于研究元代中朝关系有很大价值。照那斯图的《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兼论扬州等处发现的夜巡牌》(《民族语文》第4期),对1985年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发现的元代数种文字合璧的夜巡牌作了考释,并与同类几个牌子加以比较,认为其共同特征是:并用几种文字、元顺帝时物、夜间执行公务的证件,并认为这三面夜巡牌为研究元代牌符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文书研究方面,方龄贵在《读〈黑城出土文书〉》(《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中,认为李逸友编著的《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收录了许多新的史料,有的可与《元史》互证,有的可补《元史》的不足,有助于蒙元史的深入研究。张培瑜和卢央的《黑城出土残历的年代和有关问题》(《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研究了黑城出土的汉文文书的五件残历,认为它们都是元大德和至正时期授时历书残页。并从中得知《授时历》创立了历书新格式,使历书眉目一新。周绍泉在《徽州元代前后至元文书年代考析》(《江淮论坛》第4期)中,对迄今发现的徽州元代契约文书中,有四张属于至元年间的问题进行了考析。关于元代考古与考古研究的文章还有不少,这里不一一赘述。

叶新民的《元上都研究综述》(《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从三个方面对元上都研究概况作了介绍:一、旅行家笔下的元上都;二、元上都遗址调查情况;三、关于元上都历史的研究。他还对今后元上都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给人们深入了解元上都提供了参考。王晓清在《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中州学刊》第6期)中认为,宋元时期正统之辨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这既是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也是史学内在发展逻辑的表现。将“正统论”纳入宋元史学发展趋势加以整体性考察,显然是有其认识价值的。《西方的蒙古史研究》一书由前苏联学者马·伊·戈尔曼著,陈弘法译,1992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铅印本。乔吉和忒莫勒在《简评〈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中认为:此书展示了西方蒙古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对其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局限、代表学者的思想倾向、重要著述的基本观点等进行了评价。它将有助于我国蒙元学界放眼世界、广泛利用西方文献和吸收外人成果。

对《剑桥大学中国学的 历史与现状》一文的补正

王小甫

1994年3月至12月笔者受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王宽诚奖学金资助,在剑桥大学东方系做博士后研究,并受麦大维教授推荐在圣约翰学院做了一个学期的海外访问学者。